

西部的困局与开发——历史成因与现实图景

Difficult Position in the Western China and Its Development

朱厚泽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学术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北京 100036)

我国的西部开发,已日益成为当今全国关注的热点,甚至也成为当今全球关注的热点之一。

这种共同的关注是与中国西部的战略地位相关联的。

从地理位置看,西部是欧亚大陆的脊梁,是世界最高的陆地。它拥有最大的山岭和最高的山峰。从人类文化的角度看,西部称得上是民族和文化的大观园。多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不同宗教在这里流传布演,多种文化在这里交汇交融。是历史上东西文明迎面相遇的地带,也是当今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并存共处的地方。从经济前途考察,西部是自然资源储量极其丰富的地带,无论光热、土地、动植物资源、水量水能,还是石油矿藏,西部都拥有巨大的潜力。在全球不可再生资源日愈匮乏的今天,西部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无疑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充满希望的宝藏。从国际关系考察,西部又是多国会聚、国境相邻、恩怨交替、纷争不断的要冲。随着以对话代替对抗的潮流,多边合作、共同开发的前景已经展现,这里无疑将成为国际多边经贸合作的热点地区。

强烈的关注,也与近15年发展进程中,东西部间的发展差距日愈扩大有关。

改革开放使东西部都加快了发展,全国都在受益。但是,东部与西部差距确实实是扩大了。这就在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上引出许多问题。特别是生态环境日愈恶化,贫困状况变化不大,而政策措施却屡屡缓于见效,这就不得不引出许多忧虑,引出加快西部开发和发展的强烈呼声。

历史的回顾与前瞻

西部发展的长期滞后和在现今阶段上的难于超前,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如:在区位条件方面,地处欧亚深内陆,与各大发达的经济中心城市和经济密集地区距离较远,又缺乏可通航的江河湖海等自然通道。地形地貌

上,或沙漠戈壁、广袤无垠,或高山深峪、丛山峻岭。致使在此建设各种基础设施,技术难度大、周期长、费用高,以致各种道路和通讯网的密度和通达能力都很小。再加上长期闭关锁国的政策,致使西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越来越趋于封闭,关山阻隔、交流阻断、信息闭塞、知识贫乏、意识保守。加以人口数量扩张、素质下降、环境超载、生态恶化,导致人口、资源、生态的关系,科技、经济、社会的发展,日愈陷入难于自拔的恶性循环之中。在近半个世纪中,国家确曾在经济开发方面提出过对西部倾斜的意向,一度出现过向西部投资的高潮。但在高度集中的行政计划体制的以重工业为中心、超英赶美、军事战备为目标条件下,虽然依靠投资的倾斜也建设了若干铁路干线和水火电站,形成了若干新的矿区和工业城市,但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资源掠夺型开发,即以极低的计划价格将资源调拨出去,西部在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两方面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虽然引进了某些现代技术文明,但与西部城乡发展脱节,形成某种孤岛镶嵌状态,使西部原有的二元结构更加突出了。这些虽然将来都会有某种回报,但在穷困的西部,在近半个世纪发展的初始阶段中,代价显然是太高昂了。从近期的政策体制环境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双轨并存,对西部这个农牧矿业为主,以输出粮棉猪和煤电矿产为主的前工业化或低度工业化地区,处境仍旧是很不利的。

近年来,西部开发的声浪,通过各种传媒,日甚一日地高涨着。加速西部开发,确实反映了大家共同的心声。但从综合比较中观察,我估计:对西部地区全面的、大规模的开发,可能是下个世纪的事情。甚至是下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的事情。人们都想提早,但实际上较难办到。在可见的未来,看来只能在城市和有条件的资源富集地区的若干点及点和点的连接线上——公路铁路沿线、江河沿线、某些国境沿线,以这些点、线为核心,在周围大小不等的辐射区域里,进行一些规模大小不同的开

发;只能在有限的国土范围上,进行有限的环境和生态治理、农地整治和农业引水,进行部分道路、通讯、电力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只能进行一些能源和矿藏的开采。这些,可能仍是一段历史时期内最主要的内容。其直接目的,还在于制止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求得农民有些许稳定的耕地和一般可靠的水源,以求持续稳定的温饱。当然,这些事本身就包含着西部的开发,但从较长时期宏观的角度观察,这些实际上都带有为下个世纪西部大规模全面性的开发作准备的性质,不过是西部开发的前奏罢了。

西部开发与生态重建

西部地区的整治和开发,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实质上是生态重建问题。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西部的广大国土和自然资源似乎具有无限的性质,似乎可以任意开采,无需限制,也不需报偿。人们对西部资源的长期掠夺,在环境保护上又缺乏自律,使西部的土地早已不堪重负,西部的生态环境实际已处于崩溃边缘。现在的困境,实际上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西部的生态重建,首先面临的是两大地区的问题:一是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即沙漠与草原、耕地的边缘连接地带;另一是西南石灰岩地区。前者已引起人们重视,国家设有专门的项目、资金、科研机构,已初见治理成效。而后者则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缺乏系统、切实的措施。西南石灰岩地区约有50万平方公里,其中贵州、广西、云南就占32万平方公里。这里坡度大、土层薄、暴雨集中、生态脆弱,而其地理位置又处于长江、珠江中上游,是富庶的长江、珠江三角洲的天然屏障,生态建设影响极大。从实地观察看,石灰岩地区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植被的。贵州省荔波县茂兰喀斯特岩溶森林保护区至今仍树高林密。广西马山县弄拉村的林木,虽三度遭大破坏,但近30年坚持植树,现已满山青树,人均年收入达千元。可见,破坏了的生态是可以重建的。

实现生态重建的前提,是正确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要轻信“人定胜天”、“一个吃掉一个”之类的豪言壮语。要尊重自然、理解自然、顺应自然,塑造自然时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同自然共存共荣。广西马山县劳动农民在峰丛洼地中,创造的“弄拉之路”就证明了这点。

实现生态重建的必要条件,是减轻压力。一是人口压力,非搬迁出来不可的人,一定要及早迁出,或搞劳务输出;二是开发强度要减压,要坚持退耕还林、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广西人叫“砌墙保土”,贵州人叫“坡改梯”。把石灰岩上十分稀缺的那点泥土保住,植树种草,以免冲蚀,长期坚持,必有成效。

当然,生态重建问题不是一届政府能解决的,因此,许多专家呼吁:国家应将西南石灰岩地区的整治列为国家专项,建立国家专案,设立专项资金,制定长期的专门规划,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一届又一届,一代接一代,持之以恒地去保护人们赖以立足的生存空间,重建人类得以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西部社会经济发展与 深层的工农关系

西部的整治和开发,从社会经济层面看,实质是个工农关系问题。

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快速赶超战略,实际上是一种这样的战略,即以低价格的粮食和其他初级产品、低价格的劳动力供给为基础,靠“剥夺”广大农村和农民获得原始积累,靠“快速育肥”建起少量基础工业、军事工业和少数城市来实现工业化的战略。如果说这种情况在落后国家发展的起始阶段难于完全避免的话,那么,在工业总值已经接近农业总值后就应当转而重构城乡关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但是,正因为这个工业化是靠低价供给支撑,依靠计划体制和国家权力保护,靠剥夺农村而“快速育肥”出来的,它先天就缺乏追求效益的基因,因此从一开始,它自身就蕴含着低能低效和粗放扩张的本性,蕴含着权钱失督失控的腐败条件,加之各级政权、权力又恰巧是以这样的企业作为财政支柱的,于是,政权和国企二者就从根基上捆在一起,陷入既低能低效,又不断膨胀的恶性循环之中,且越陷越深。

这是一个战略陷阱,也是一个制度陷阱。其经济社会后果,则表现为我国工农二元、城乡二元、东西二元结构的长期分离、僵滞、固化和加深。东部与西部两大板块间差距的扩大和人们对两大板块间发生断裂的担心,正是这一实质性焦点的集中反映。

探索西部整治开发之路,对这种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快速赶超战略选择,和以国有制一统天下为基础的集中行政计划制度选择,似有必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否则,恐怕是很难找出一条工农、城乡、东西部协调发展的出路的。

国有企业的“一大二公”到了该改制图新、理智抉择的时候了

国有经济的改革,从1979年起就始终作为经济改革的中心课题,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强调着。而如今国有经济却已难以为继,已呈不改革绝无出路之势。给企业扩权、放权让利、利税分流、承包经营……,十几年来,搞了好几轮。这些局部性的改进,都起过一定作用,但都未能根本扭转国有经

济和国有企业在低效益下徘徊,甚至恶化的趋势。国有经济的改革为什么如此艰难?很值得、很需要从深层次去进行思考。

现在看,国有经济的改革要重新破题,一个是宏观上国有经济的总体结构布局要调整,一个是微观上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要创新,这两件事好像是躲不过去了。

把国有经济搞得无所不包,搞出那么大一堆,究竟是科学社会主义题中必有之义,还是与革命发展的童年时期难于避免的稚气有关?把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搞得那么“一大二公”,而在企业的资产经营和实际运行中,却又实际上形成无人负责、难于负责,或无力负责的格局。这对发展经济、富民强国,是利是弊?又与科学社会主义,有何相干?

“抓住大的,放开小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该是到了听从生活、实践的检验,服从理智抉择的时候了。

东西差距,主要就差在非国有经济发展上

东西部之间经济上的差异,在经历了十几年改革与发展后,突出地反映在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差距上。

西部广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至今仍然有70%,乃至80%是依托于国有经济的。例如贵阳市,其工业总产值的85%至今是靠国有企业提供的,加上被改造为“二国营”的二轻企业,占了全市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而东部恰恰在改革开放的16年中,发展出了一大块非国有经济,使其成为地区经济大发展和国民收入高增长的源泉和重要依靠。

实际上,中国改革发展的特点,也是优点之一,正在于:在传统国有制的旁边,放手地发展起了这样一大块非国有经济来。这一大块非国有经济高速度、大规模地发展,缓解了文化大革命10年,甚至那以前17年中所遗留、积累起来的许许多多的经济社会矛盾、困难和问题,并且成为新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新的生长点。

依靠十几年发展起来的这一大块非国有经济,不单使人们衣食住行上的很多紧张情况得到缓解,城乡生活消费品供应大有改善、质量大有提高,而且城乡大量长期失业人口得以就业,人们的收入普遍有了增加,财政税收总量有所增加,结构得到改善。这种情况又为国有经济的调整、解困和发展,提供了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提供了渐渐扩大的市场条件。如果没有由乡镇企业、三资企业以及各种集体、个体、私有经济的发展构成的这一大块非国有经济,我国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状况将会怎样?

那种日子是不难想象的!

这一大块非国有经济意义,当然不只是经济的。

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依托在这一大块新生的非国有经济基础之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与各个方面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依赖少了,自立多了;依附少了,自主强了。一切等待“上级指示”,消极听从“国家安排”,依赖救济,等待恩赐,乞求施舍……再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了。自寻出路,自立门户,自主经营,自求发展,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创造,自我实现……,正在人民中间逐步成为风气。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变化啊!

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变化,一个不同于“国家号令一切”的那种传统运作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民间社会,在神州大地上静静地一步一步地显露出来。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这样一个民间社会是那样地生动活泼、朝气蓬勃,它以其对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持续有力推动,正在为自己争得正正当当的生存权利,并正在逐步为有识的人们所认识、所承认。而当今西部地区,则由于非国有经济的贫乏而使民间社会难产。这种差异,最突出也最形象地反映在东西部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上。人们在东部地区、沿海城乡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中,经常听到的希望是:“少少干涉”。而在西部,随处都会听到的强烈呼号却是:“多多关照”!

这确实是开放的程度不同、改革的深度不同、市场的进展不同、经济结构的变革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不同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深层差异。也是发展的阶段不同、运行和起飞的态势不同所表现出来的深刻差别。

看来我们不得不走一条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之路。

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既是当今之出路,也是开拓未来之根本

无论是发展战略的转变,组织制度的创新,都只能从扩大开放中去探寻。而东西部的差距也集中表现在是封闭还是开放这个焦点上。

“四项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这话似已成为当代的经典语言了。但我们也无妨再想一想。什么是本?在汉语里,本,大体指的是根本,即本质、本体,也就是那些在事物发展长过程中,始终比较恒定、保持不变的东西。路,则是可以选择的,因而是可以变动、并非长期恒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开放,它对我国的改革和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显然,开放,它不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开放,本身就是我们的目标,体现着我们的

目的。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一全面、深刻的改革,长期、持续的发展,建立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制,包括开放的、人民得以参与的,甚至是以人民实际拥有为本位的产权制度;构建一个开放的政治体制,亦即人民广泛参与的、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营造一个开放的社会结构,即具有广泛的社会内外交流,具有对外扩散和对内吸纳移民机制的、开放的社区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培育一个开放的文化心态,既尊重自己的民族传统,又能有容人之量,敢于和善于吸收外域和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走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这后一点,对我们这个具有优秀古代文明的汉民族更加显得重要,对西部这个自然环境和长期历史上都比较封闭的地区更为显得重要。要搞现代化,如不能在全地区、各民族都形成共同的开放的文化心态,努力学习、借鉴外域文明,那能争得一个什么前途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虑,改革开放,就不仅仅是个出路问题了,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应该也提到“本”的地位上去呢?

外国人写过大部头的中国科技史,列举了大量我们民族在古代历史上的科技成果,指出了这些古代创造的文明对西方文明进程的影响,当然是很辉煌的。

但是,如果作一点粗浅的观察,似乎不难发现,那些技术成果,似乎主要还停留在器物层面上,带有很大的经验和技艺的性质。这在古代当然是不足为奇的。但在此后,在我们民族历史的长时期里,似

乎始终也没有进一步深入探索、积累、发展、建构、形成比较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或技术理论体系。在我们民族传统文化自身的演化发展中,没有发育出现代社会所赖以建立的现代科学理论体系和现代技术知识体系。若与欧洲近代史对比,正恰恰强烈地表现出两种文化的差异。

我们民族在古代,很早就提出了“格物致知”的深刻哲学命题。但我们好像并没有认认真真地、持之以恒地对着“物”,不断地“格”下去。是不是把注意力转到“革人”上头去了?

看来,一个民族一旦失去对“格物”的高度热情和一以贯之的挚着追求,那就很容易转而形成一种天天“捉摸人”、“人斗人”的浓厚兴趣,陷入“革人”的深渊,陷入一幕又一幕“革人”的民族悲剧之中……。

如果说“格物”可以“致知”,引人思索,启迪智慧,教人聪明,培育文明,那么,丧失“格物”的热情,轻视“格物”的成果,厌恶乃至敌视勇于“格物”的人才,甚而“革人”,而且是“年年革、月月革、天天革”,那就很难不陷入“致愚”、“致蛮”的历史怪圈,甚至陷入暴戾的深渊。

总之,发扬科学精神,争取科技、经济、社会综合协调的发展,无论对于当今西部的脱贫和整治,还是将来的开发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责任编辑 蔡德诚)

彩图说明

北京天文台兴隆站——我国最好的光学天文观测基地

胡景耀

(中科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 北京 100080)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建于河北省兴隆县燕山山脉海拔近千米的丛山峻岭之中,是目前我国最好的光学天文观测基地。它因位于我国晴天日数最多之一的华北地区,有较好的大气透过率和视宁度,又因离大城市较远,城市灯光污染小。在兴隆站安装有包括远东口径最大的 2.16 米光学望远镜在内的一组望远镜,它们可以分别用不同的手段得到来自天体的信息。超新星观测研究计划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兴隆站的主要设备有:

2.16 米光学望远镜(见封二图) 它配备有高、中、低色散光谱仪和高灵敏的 CCD 相机作探测器。超新星的光谱观测就是由这一望远镜作出的。利用它同时进行着包括天体多波段较差证认、活动星系核、恒星化学丰度等重要的观测研究。封底是该望远镜的观测圆顶。

1.26 米红外望远镜(见封二图) 它能进行远红外

的光度和光谱测量。天体的近红外观测是研究恒星形成区、恒星早期和恒星晚期演化的重要手段。

60/90 厘米施密特望远镜(见封三图) 利用 2048 × 2048 像元的大面积 CCD 相机,使它可以覆盖 58' × 58' 的视场,进行重要的多色巡天计划。用它曾作过超新星 SN1993J 和 SN1994D 的测光研究。

85 厘米红外望远镜(见封三图) 它配备有三通道高速光度计。可以用它进行白矮星星震、短周期脉动变星和密近双星等有趣的观测研究。

60 厘米光学望远镜(见封三图) 它在主焦点配有 1024 × 1024 像元的 CCD 相机。主要用来作超新星巡天和光度测量。SN1996W 就是用它发现的。用它同时还可进行发射线天体、星团测光和天体精确定位等观测研究。

(责任编辑 王宏章)